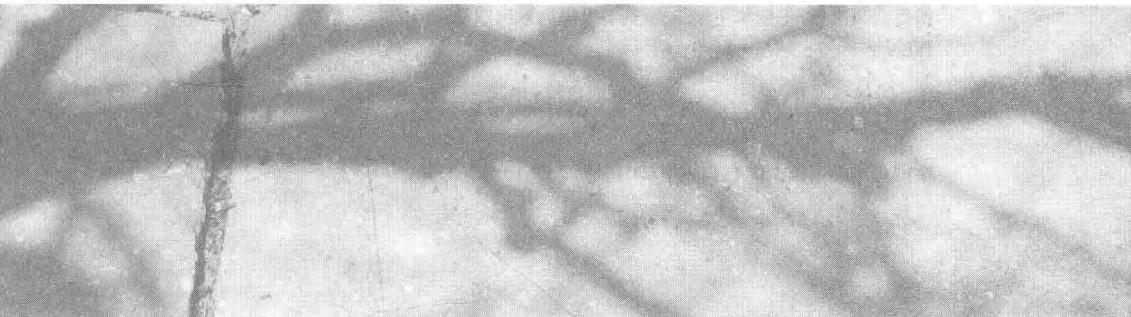


# 傅雷家风家教

王树华 主编



# 傅雷家风家教

王树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雷家风家教/王树华主编.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

ISBN 978 - 7 - 5476 - 1190 - 6

I. ①傅… II. ①王… III. ①家庭道德—中国—现代

IV. ①B82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9846 号

**傅雷家风家教**

王树华 主编

责任编辑/刘丽娟 装帧设计/李 廉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http://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7.5 插页：1 字数：323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6 - 1190 - 6/G · 762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 - 62347733 - 8538

# 目 录

## 一、高尚人格的传承

题为《傅雷家书》的一曲交响乐章	榎本泰子	003
傅雷与傅聪：阐释的艺术	陈广琛	015
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	金圣华	025
但愿春永在，波长平	朱佛恬	028
傅雷尺牍的意义	张瑞田	034
傅雷的审美观 ——重神似不重形似	金志平	041
在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成立 大会上的讲话	傅 敏	045
凤鸣于桑榆 求凰和于李桃 ——傅雷与黄宾虹八秩书画展览会	胡 震	047
我所了解的父亲 ——傅敏、陈明哲访谈	李家涛	055
傅译的文化意义	许 钧	064
浅析中国傅雷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	赵维纳	073
怀念傅雷先生	叶兆言	087
君子的选择	胡明媛	092
开发傅雷教育资源，传承傅雷人文精神	傅国庆	096
一卷正片胶卷：《傅雷家书》	白井启介	098
在“傅雷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阮波	110
试从心理学角度探究傅雷先生的心路历程	严林祥	113
论《傅雷家书》	叶永烈	122
怎样认识译坛巨匠傅雷	宋学智	133
在“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芝联	141

## 二、“我心中的傅雷”获奖征文

1. 成人组获奖征文		147
傅雷给人类留下了他蓄满大爱的心	韩 翔	147
解读傅雷之“怒”	韩建东	152
孤傲的背影	郑 悅	160
抚摩心灵的慰藉	管祥国	162
傅雷：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万蓓蕾	165
“孤独的狮子”与“墙洞里的小老鼠”	陆颖燕	172
傅雷印象	付铭骥	176
那些美丽忧郁的碎片	黄炳连	181
博识·真诚	方海燕	185
我心中的傅雷	卞勤生	190
读家书 想傅雷	傅 坚	195
于无声处听惊雷	周学丹	198
天地一沙鸥	强慧超	200
傅雷，在我心中的印象	毛 逸	206
爱与火的重生	冯 军	208
译坛忠魂赞	卞 权	214
生命的穿透力	高玉飞 张佐香	218
他，是位父亲	张 烨	222
闲话傅雷先生的“赤子之心”	蒋 学	224
一路有你	李 勇	229
2. 情景诗朗诵		232
永恒的家书	陈达明 曹石麟	232
3. 学生组获奖征文		241
生如夏花	张燕丽	241
爱的箴言	陈嘉兰	245
大爱无声	赵诗戈	248
我心中的傅雷	陈海红	251
在成功时不忘努力超越	沈 燕	255
品读傅雷人生	周安妮	258

做你的“园丁”	夏 晶	260
读家书,品傅雷	俞晨晨	264
是真名士自风流	胡 畔	267
纪念傅雷百年诞辰“我心中的傅雷”征文演讲作品		269

一



## 高尚人格的传承



# 题为《傅雷家书》的一曲交响乐章

榎本泰子

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与夫人一起在家中卧室悬梁自尽。在这之前的8月30日深夜，一群红卫兵冲进傅家，搜寻了三天三夜，找出了所谓傅雷的“反党罪证”。面对曾经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傅雷，红卫兵们的追究自然是毫不留情，加上其子傅聪流亡英国，对傅雷的批判更是变本加厉。枉受不白之冤的傅雷心中那种悲愤和绝望之情，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遗书中痛切地感受出来。正是那个冷酷无情的世界将这个对艺术和人生极其忠诚的文人逼上了绝路。

身处异国的傅聪得知双亲的死讯，是在两个月之后。在纷至沓来的记者面前，傅聪缄默不语。只是在一次音乐演奏会上，傅聪面对观众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晚我演奏的曲目，全部都是我父母的生前所爱。”“文革”结束后，傅雷夫妇的名誉得到恢复。1979年，傅联回国参加了为双亲举行的追悼会。而这距他流亡英国，时光已经整整流逝了二十个年头。

## 傅雷与他的时代

《傅雷家书》自1981年在中国首次出版以来，保持了二十多年经久不衰的发行纪录。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新版本，其中收录了傅雷家书161封，夫人朱梅馥的书信39封。本书从中选译了傅雷的书信60封和朱梅馥的书信14封。

傅雷的这些家信，最早写于1954年。傅雷借儿子出国留学的机会，将自己的内心世界用书信的形式，而且是面对亲人，因而也是以最直截了当、最不加掩饰的形式吐露出来，从而留下了他十多年来这一段精神轨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例子。

在中国，傅雷以法国文学翻译家著称。在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因特网的时代，一般大众对外国缺乏了解，向他们介绍外国文学也非易事。因此傅雷的工作就

不仅仅是局限于语言文字上的翻译，还必须对外国的文化、风俗也加以考证，并对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做出分析，也就是说扩充到了学者和艺术批评家的领域中去了。从本书中所收录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傅雷的学识涉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他称得上是一个精通东西文化的思想家，并拥有一个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

傅雷于1908年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现上海市南汇区）。由于父亲傅鹏飞英年早逝，母子相依为命，傅雷的幼年时代过得相当寂寞。母亲李欲振将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儿子身上，而且因为望子成龙心切，据说有时态度还相当粗暴。日后傅雷对待自己的长子傅聪也极其严厉，有时甚至动手，也许和他自己幼时的经历不无关系。

傅雷跟随家庭教师熟读了四书五经之后，转入了上海市内的学校读书。他先后就学于徐汇公学、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并于1926年考入了上海持志大学。但傅雷不满于该校的教学内容，翌年在姑母傅仪和表兄顾伦布的帮助下，终于说服了母亲，得以顺利赴法国留学。这段留学经历培养了傅雷丰富的西方文学艺术的教养，对他的人格形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8年秋傅雷进入了巴黎大学文科学习，同时还在卢浮美术史学校学习西方美术史。在当地傅雷接触到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并与许多日后成为中国文艺界重镇的人才私交甚厚。在他们中间，就有中国美术界之翘楚刘海粟。傅雷常和刘海粟等人一起去各种美术馆参观，加上与巴黎美术界人士的交往，使他得以对西方美术有了一个较为准确的理解和认识。

除了美术，傅雷对西方音乐也抱有极大兴趣，不时去聆听音乐演奏，观赏歌剧表演。有一段时间，傅雷还爱上了一个法国女子。恋爱的烦恼，加上思乡之情和对未来的不安，傅雷患上了“青春期的、浪漫底克的忧郁病”（见1954年8月11日致傅聪函）。就在这个时期，傅雷阅读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深为作品中描写的“英雄”形象所打动。贝多芬战胜艰难困苦的人生，并创造出无数不朽名作的坚韧毅力，成了傅雷的精神支柱。而这段经历还使傅雷日后翻译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名作。

傅雷在法国的四年间，虽然最后没能拿到文凭，但这段留学生活培育了他对西方文化艺术的爱情和理解，对他的后半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931年傅雷回国后，担任了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办公室主任，并教授法语和美术史。但是生性耿直、直言不讳的性格，令傅雷常常与他人发生冲突，这段教师生活并没能持续多久。傅雷从十七八岁起就尝试过小说创作，因此这段时期他曾希望以文笔成名立业，并一度致力于美术批评。他和友人一起创办了艺术杂志，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艺评论文章。但在战乱逐渐升级的年代，

文艺批评实在难成气候,傅雷渐渐将精力转到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上。

傅雷在留学期间就已经显现出了出色的法语能力。凭借着极强的语言才能和深入细致的调查考证,以及对译文的反复推敲,傅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莫罗阿、伏尔泰等著名法国作家的三十多种作品,都是通过傅雷的翻译才得以在中国广为人知。而其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文译本,日后被文化史研究者推选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令作者罗曼·罗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作,作品主人公是一个音乐家,在他身上有着贝多芬的影子。傅雷历时五年翻译了这部巨作,于1937年出版了第一卷,而第二卷至第四卷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出版。作品主人公克服种种困难成长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的历程,以及字里行间显现出来的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理念,深深打动了当时的中国学生和知识界人士。作品中所描绘的“英雄”形象——那种身负时代的艰难困苦,献身于社会和全人类的伟大精神,得到了在侵华日军蹂躏下的中国人民的广泛共鸣。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傅雷自1952年起开始着手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从中也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之重。而正如本书中的书信所提示的那样,由于儿子出色的音乐才能,这部作品又从另一个角度成为了傅雷的理想和希望的象征。

在傅雷的翻译事业中,巴尔扎克的一系列作品也不能忘记。《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高老头》等名作都是经傅雷之手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最近在日本上映的中国电影《中国的小裁缝》就生动地反映了傅雷的翻译给中国读者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影片根据戴思杰用法文创作的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的小裁缝》改编,原作已由新岛进译成日文,由早川书房于2002年出版)。这部影片讲述了“文化大革命”中下乡到四川山区的两个知识青年,偷偷阅读当时被定为禁书的外国小说,并将小说内容讲述给不识字的村民们听的故事。而其中一个小伙子的恋人、一位漂亮的乡村小裁缝,则通过他讲述的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了大山外面还有着陌生的广阔的世界,她盼望着能去看一看那个未知的世界,终于有一天抛下小伙子们离开了山庄。可以说,让影片里的年轻人热血沸腾的,正是文学所具有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而以流畅的文笔织造出这种文学魔力的,正是傅雷的翻译。顺便提一下,傅雷开始动笔写这些家信正是在1954年,而那年9月至翌年4月他正好就在翻译《于絮尔·弥罗埃》这部作品。恐怕连傅雷自己也不会想到,他的这部翻译作品,竟然会在半个世纪之后,又通过别人创作的小说和影片,而广为世界各国的读者和观众所知吧。

虽然傅雷的翻译作品在中国流传甚广,并感动了无数读者,但有关傅雷本

人，在他生前恐怕少有人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傅雷也和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一样，面临着是参加祖国建设，还是去国外生活的抉择。傅雷于1948年为避战乱携家人从上海去了昆明，后又离开昆明去了香港，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归祖国的道路。刚回上海的一段时间，也由于健康上的原因，傅雷基本上是闭门不出，埋头翻译工作。

本书所介绍的傅雷家书跨越了1954年1月至1966年8月这长达十二年半的光阴，而这段时间又正好与埋头书斋的傅雷开始关注起外面的世界这一段人生历程相重叠。本书的前半部分，即傅聪出国、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并活跃于欧洲乐坛的那段时间，也正是傅雷开始关心政治、春风得意的时期。加上“傅聪之父”的名声，我们可以感觉到傅雷的那种兴奋之情跃然纸上。但是傅雷直率的发言最终让他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父子俩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傅聪在结束了波兰的留学之后，于预定归国前的1958年底，转赴了英国。这个举动对他的双亲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那之后傅雷家书也因种种原因中断了将近一年，从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傅雷夫妇的不安和焦虑。

傅雷的晚年，主要埋头于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工作以及和儿子的书信往来。本来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中国和流亡资本主义国家的儿子之间的通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据说是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而得到了实现。而且从信中看，似乎钱物的赠送也得到了许可，傅聪因此能够给病弱的双亲给予了经济上的援助。傅雷虽然于1961年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最先遭到批判的还是这些“脱帽右派”。傅雷之所以遭受红卫兵的冲击，据说是因为他和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李翠贞私交甚好，而李当时被指认为是外国“间谍”。傅雷因此自尽身亡，而李翠贞也在自己心爱的钢琴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长达十年的“文革”风暴终于过去，当人们又重新渴望起文学和音乐时，傅雷的名字又复活了。傅雷夫妇发出的那些信件，几乎都完整无缺地保留在伦敦的傅聪手边，日后转交到了在北京工作的傅敏手中，经过整理、编辑，于1981年以《傅雷家书》为题得以出版。历经苦难、将毕生精力投身于翻译事业的傅雷这个人物因此广为人知，而他那高洁的人格和精深的学识，也深深打动了年轻一代的心。比如日后以《黄土地》《霸王别姬》等影片而闻名世界的电影导演陈凯歌，就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提到了傅雷：

傅雷也是一代大才，却一生未求他人的理解。他对生的领悟不止于欲望，对死的选择也不尽迫于外力。所以才来去闲闲。他的死当然因为愤怒，但更因为骄傲。此生事已毕，他和夫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如推门进入别室一

样安详。回首尘寰，既无褒扬，也无怨恨，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希望，也许希望已经在他的译作中了。真人的自毁，好像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花香。（中略）

古之慷慨悲歌之士，为自由或信仰，更多为尊严荣誉的缘故，不能立身便自毁自身。就这一点，傅雷“先生原来古之儒”（陈凯歌《少年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至123页。本书在中文版出版发行之前，最早由刈间文俊以《我的红卫兵时代》为题，译成日文由讲谈社于1990年在日本出版发行——译者注）。

陈凯歌的同龄人，在“文革”期间度过了青春时期的红卫兵们，如今大都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栋梁。而即使在那个让无数人的命运跌宕起伏的动乱年代，仍然傲然屹立的傅雷的形象，今后也一定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吧。

《傅雷家书》出版后，《傅雷译文集》十五卷也在1981年之后陆续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文集没有题名为《巴尔扎克作品集》或是《法国文学作品集》，而是以译者的名字命名，这种译文集在中国还是首例。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傅雷在解放前发表的评论文章也重见天日，1998年《傅雷文集》全三卷出版，里面收录了作者在文学、美术和音乐各个领域纵横驰骋的艺术评论，以及从抗战到“内战”时期所发表的各种政治评论文章。可以说傅雷这个人物的整体形象至此才终于得到了全面展现。2002年，在此基础上的《傅雷全集》二十卷得以出版。这不仅令我们能够全面了解傅雷，同时也是探知解放前后生活在上海的知识界人士的生活和思想的珍贵资料。

上海自19世纪中叶起，以西欧列强的租界地区为中心而日益发展，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成长为一个被称作是“东方巴黎”的繁荣都市。由于同时代的欧美文化的大量涌入，上海的租界地区一直处于中国近代文化的最先端。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就是报纸、杂志、电影广播事业等新时代的传媒艺术也都是在这里得到发展。而在这些领域里承担了重要责任的，正是一帮从欧美和日本留学归来的知识界人士。从《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傅雷交友极广，而友人中有很多人和他一样，在上海受到了近代教育的熏陶，之后赴欧洲等地留学，并因此精通了外语。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中国最了解西方文明的一群。但是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也就是从抗日战争、“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这一段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思想逐步受到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知识分子们将如何面对自己所拥有的西式教养呢——研究傅雷的一生，也有助于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 盛开于上海的西方音乐之花

我在选译《傅雷家书》的过程中,为了准确地传达傅雷的人格特点,尽可能地介绍了傅雷涉及艺术、人生、教育的论述。因为儿子是钢琴家,傅雷的信中自然有许多涉及音乐的篇章。而他笔下那些有关莫扎特、贝多芬之类的评论,也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让我们得以了解中国人是如何聆听西方音乐的。

傅雷度过了人生大半辈子的上海,原本就是近代以来中国著名的音乐之都。20世纪初期,大量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谋求近代化之路而来到日本,并将西方的学术思想带回了中国。而同时也正是这些留日学生最先注意到了西式的音乐教育。比如出生于上海的沈心工,就将日本儿童爱唱的西式歌曲填上中文歌词,回国后编纂了许多中文歌曲集(当时称之为“学堂乐歌”)。而这些曲子日后成为了上海小学学校的音乐课教材,而多来米发唆这种西式音阶也因此得到了普及。当时在中国各地的租界开设有许多教会学校,通过外国教师的传授,中国孩子也接受了一些赞美诗以及钢琴之类的音乐教育。尤其在上海,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广大区域,光是教会学校就有好几所,富家女子会弹钢琴的也不在少数。傅雷的妻子朱梅馥就是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据说也会弹钢琴。而且她的英文程度也很高,因此在为傅雷誊抄稿件和书信、整理资料等方面所发挥的“贤内助”之功也广为人知。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音乐的世界里,在人前弹奏乐器,只能属于“艺人”所为,富家子弟要将音乐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是为人所不齿的。但是1922年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开设了附属音乐传习所,招聘外国教师教授钢琴和小提琴课,音乐从此作为西式教养的一个部分而渐渐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是“美育”(艺术教育)的倡导者,北京大学也是汇集了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是这种看上去全新的音乐教育,仍然相当浓厚地反映着传统的、儒教的音乐观,也就是说希图通过音乐来“陶冶人格”、“维持公序良俗”。可以说,这种音乐观和教育观,是中国人接受西方音乐之际的一个显著特点。

1927年,中国最初的独立的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在上海创立,中国音乐教育的中心也因此移往上海。当时的北京,很难找到优秀的音乐教师,相比之下,在上海以当地的英国人为中心的音乐活动则相当盛行,此外还有工部局经营的正规的工部局乐队。因此国立音乐院(后改称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得以招聘到乐队的来自意大利的首席小提琴演奏者以及俄国流亡音乐家作为音乐院的教师,力求将学校的音乐教育达到世界水平,而这里

也因此成为了培养中国第一代音乐家的摇篮。

傅雷的长子傅聪出生于 1934 年,据说从很小的时候,就对傅雷常听的古典音乐的唱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傅聪 7 岁时,随父亲的友人、数学家雷垣学英语,而雷垣以前曾经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过,家里摆有钢琴。一天雷垣在傅聪面前随意敲击琴键,而傅聪不看也能复述出每一个音来,也就是说他具有“绝对音感”。傅雷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并决定让傅聪学弹钢琴。傅聪每周一次去雷家学琴,但因为家里没有钢琴,无法练习,傅雷夫妇几经考虑,卖掉了朱梅馥作为嫁妆的金银首饰,为傅聪买了钢琴。当时的中国还不能生产钢琴,市场上只有少量价格昂贵的进口产品。据说钢琴运到傅家的那天,邻居们全围过来观看,窗外是人头攒动。

傅聪进步惊人,并非钢琴家的雷垣很快就觉得力不从心了。傅聪随后跟从本书中也曾提到过的一个叫李蕙芳的女性学琴,在那之后又拜了当时上海音乐界的著名人物梅百器(Mario Paci)为师。梅百器是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和指挥家,而他的老师斯甘巴蒂(G. Sgambati)是 19 世纪最大的钢琴名手李斯特的弟子。梅百器自己也早在 17 岁时就在李斯特钢琴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因此称得上是李斯特派的嫡系钢琴家。梅百器于 1918 年底在各国巡回演出,途经上海时,因其才能受到重视而被聘任为工部局乐队的指挥。曾经担任过意大利歌剧院副指挥的梅百器,率领着这个由各国音乐家组成的乐队,致力于各种音乐活动,为上海音乐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梅百器于 1942 年退出了乐队,之后主要靠教授钢琴谋生。而傅聪的钢琴基础,就是在这样的音乐大师的培养下形成的。但是梅百器于 1946 年在上海亡故,加上正值“内战”的混乱时期,傅聪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靠自学。之后傅雷一家为避战乱去了昆明,傅聪在全家离开昆明之后,仍然独自留下进了云南大学外文系读书。但是因为放不下对钢琴的钟爱,傅聪举办了个人演奏会,靠从同学们那里筹集到的旅费独自回到了上海。1951 年傅联回上海后,师从苏联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并于 1952 年 2 月与上海交响乐团(由工部局乐队改称)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皇帝》,从此正式登上了中国的音乐舞台。第二年傅聪参加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青年友好节举办的钢琴大赛,荣获第三名,并因此受邀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正如傅雷在书信中常常提到的那样,傅聪虽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音乐才能,但是由于时代的影响,没能有机会接受到系统的音乐训练,并且因为 18 岁就登台演奏,傅聪和当时国内最高水准的教育机关上海音乐学院也没能有直接的关系。他得以克服自己技术上的弱点,应该主要是缘于来到波兰之后,得到了世界著名钢琴家、教育家杰维茨基(Z. Drzewiecki)的指导,并有机会和东欧以及苏联

的优秀音乐家们进行交流的结果吧。1955年3月,傅聪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荣获第三名,成为在这个国际大赛上首次获奖的东方音乐家,同时也是第一个登上世界乐坛的中国钢琴家。当时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是波兰本国的哈拉谢维兹,第二名是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钢琴家之一的阿什肯纳奇。由此也可以想见,当时的竞争应该是十分激烈的。顺便提一下,在这年的大赛上,日本的田中希代子也获得了第十名。

此外傅聪荣获玛祖卡奖也引起了世人瞩目。因为玛祖卡一向被认为是浓厚地表现了肖邦民族魂的乐曲,因此很多人认为只有波兰人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内涵。傅雷于1957年4月在《新观察》上发表了《傅聪的成长》一文,在提及傅聪获玛祖卡奖时,傅雷写道:“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傅聪幼年时,傅雷曾经亲自选择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片段,抄写下来作为教材给傅聪阅读,努力培养他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对傅雷来说,傅聪的成功,同时也实现了他自己的理想。可以想见,精心培育的儿子在世界乐坛展翅飞翔的这段时期,也是傅雷人生中一个幸福的顶峰吧。

傅聪因为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奖而得到了华沙音乐学院的奖学金,而在波兰度过的这段时间,对傅聪的一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56年2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给东欧各国带来了萌生自由化的机运,波兰和匈牙利分别掀起了反苏暴动。政治上的“解冻”也波及到了音乐界,在1956年10月举办的“华沙之秋”音乐节上,首次上演了西欧现代音乐,对当时的波兰音乐界给予了很大冲击。在那之后波兰音乐界在追求思想自由方面显示出了相当前卫的倾向。耳闻目睹这些变化的傅聪,最终决定转向西欧去寻求自己发展的道路,应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何况当时留在国内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如果归国的话,必定要被迫站到批判自己亲生父亲的立场上去。对于深爱着父亲的傅聪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傅聪移居伦敦后,获得了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知遇之恩,并且在频频登门造访的过程中,与梅纽因之女弥拉之间萌生了爱情。本书也显示了傅職新婚生活的一些场景,令人忍俊不禁。当了梅纽因的女婿,自然令傅聪在欧洲的生活和地位得到了安定,而和岳父合奏室内乐之类的经验,应该对傅聪的演奏技巧也大有帮助。梅纽因在自传中还提到了傅雷的家书,他写道:“他的父亲(指傅雷——译者注)是著名的法兰西语言学者,我们珍藏了许多他寄自中国的书信,信中用毛笔写成的(或者说是画成的)十分优雅的法语,描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两种人种——中国人和犹太人得以结合到一起的幸福之感。”(转译自和田亘的日语译本《没有尽头的旅程——梅纽因自传》,白水社,1979年。)傅聪和弥拉生

了长子凌霄,但这次婚姻没能走到尽头。日后的傅聪和一位英国籍的华人钢琴家结婚,并生了次子凌云,而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留在国内的傅雷夫妇生前考虑好了的。

傅聪弹奏的肖邦、德彪西的乐曲最为人称道,不仅如此,他的保留曲目范围也很广,他弹奏的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斯卡拉蒂等人的作品都被灌制成了唱片。傅聪的演奏展现了他对作品深刻的理解和坚实的技巧,同时又穿插着一些大胆激情的表现手法,热情洋溢,往往令听众也随之振奋不已。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傅聪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钢琴家给予了优厚的待遇,1982年傅聪被聘任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1988年又被聘任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2004年正好度过七十古稀之年的傅聪,于1月份在北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独奏音乐会,以他充满激情的演奏令听众为之倾倒。据报道,傅聪曾经伤病不断的双手也在上海经中医治疗得到了好转,现在身心俱佳,本人甚至没有觉得自己已是七十岁,“而是感到只有十七岁”。

傅聪与第七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头奖得主玛尔塔·阿格里奇的交往也广为人知,近年他还为参加“别府阿格里奇音乐节”而多次来日访问演出。定于今年5月举办的第六届音乐节上,傅聪也将举办大师班和独奏音乐会,日本的听众们正翘首以待。

2000年举办的第十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李云迪作为中国人首次获得了大奖,中国的钢琴界也因此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这距傅聪登上世界乐坛,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考虑到中间“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空白时期,实属来之不易。目前中国随着经济的腾飞,学琴的孩子也日益增多,都市里凭借昂贵的音响器材欣赏音乐的人也不少见。如果说《傅雷家书》首次出版的1981年,傅雷笔下的西方音乐还是一种“海派”文人所阐述的艺术谈的话,那么今天的年轻读者对此一定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需要指出的是,在傅雷的西方音乐观中有着相当主观的成分,他通过各种书籍,汲取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赞所代表的那种浓厚地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时代背景的音乐观。因此往往令人觉得与其说他是在分析音乐作品的本身,不如说他更看重作曲家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特征。对当代人来说,也许会有人认为这种解释方式具有权威主义的毛病,略显陈旧吧。但是对傅雷来说,人生和艺术无法分隔,他认定若要为后世留下优秀的艺术作品,首先必须具备优秀的人格。这是傅雷在接受了罗兰的思想之后,又比照本国传统的艺术观而产生出来的一种信念,是东西方的良心相结合而营造出来的一种幸福的形态。也正因为如此,傅雷才在给傅聪的信中,反复要求儿子注重“道德”和“人格”的修炼,告诫他“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1960年12月31日傅